

2010年兩會之前，溫家寶在論及教育改革之時出人意料地批評高等院校的行政化與功利化。此後，新教改方案徵求意見稿竟然將「去行政化」列為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這一具有革命意義的舉措自然引起輿論的廣泛反響。但是，教育行政部門主管的媒體對此進行了冷處理，其他媒體方興未艾的討論熱情也遭到有關部門的「招呼」，而眾多大學校長就此在兩會期間發表了不少「雷人」語錄。眾所周知，官本位已經在中國大陸制度化，而行政化的組織和制度結構成為公共服務重重積弊的最主要根源。我刊計劃在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就高等教育中的行政化問題展開討論，歡迎賜稿。

——編者

認同、暴力與國際關係

在分析「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生態時，闡明其思想核心的歷史淵源的建構、資金來源的金融體系和媒體輿論力量，並放置到NSA的框架下分析都很重要，沈旭暉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的生態〉一文（《二十一世紀》2010年2月號），為讀者呈現出了以上諸點。需要明確的是，當今「國家」仍然是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體之一。因此，提及「東突」運動的「生態」，其來自外部環境方面的因素不能不考慮國際關係中各國的利益博弈。

首先，「東突」追求建立獨立國家的目標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是分裂主義，這是犯罪。其次，其採取的暴力極端主義手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段，危害社會穩定和人民生命安全，同樣也是犯罪。前者涉及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後者可以被提高到恐怖主義的層次。在國際關係的政治心理認知中，前者的重要性超越了後者。

對於國內的民族關係，中國政府打出的旗號是「中華民族的認同」，而「東突」希望建立的認同則是「維吾爾族的認同」，在爭取民心支持的過程中，心理認知的群體劃分就變得非常重要，這導致了認同感的塑造。無論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神話」還是「維吾爾族的民族意識建構」，意識形態都參與到了群體的心理認知劃分過程中。

暴力對於認同的維繫和歸屬感的增強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暴力本身就已經融入了「東突」的生態體系之中。正是因為暴力衝突給雙方帶來的傷害，在「復仇」的心理機制下促進了群體內的向心力。暴力為分離主義獲得持久的支持提供了燃料。暴力也是向對手的一種公開示威，不僅展示了自己的力量，也為支持者創造了自我存在感的體驗和將來投身行動的熱情和動力。如果放棄暴力衝突，也就意味著失去可資利用的不斷加以強化外部共同「假想敵」（中國政府）的機會，

加上又沒有在宗教信仰支撐下「一呼百應」的領導者，「東突」內部的鬆散與瓦解似乎難以避免。這樣一來，「東突」同樣面臨一個兩難選擇：去除暴力可以卸去「恐怖主義」的指責，贏得生存空間，但這也威脅到了它的內部凝聚力。

翟一達 東京
2010.3.5

家產制、農民生育觀念與計劃生育政策

俞江的〈農村家產制與計劃生育政策的衝突〉（《二十一世紀》2010年2月號）認為，不深入考察農民生育觀念形成的歷史與現實基礎，只單純地推行政治指令，或以撤職對計生人員施加壓力，只會激化國家與農民的矛盾，農民受到傷害，政策執行陷入泥淖中。

農村家產制的形成主要與社會分工不足、福利保障制度、憲政與民主制度不完善有關，但人口流動、家庭婚姻及經濟狀況與生存能力的階層差異等具體因素，也會對農村家庭財產的分割與繼承，進而對農民的生育觀念產生影響。同時，人口死亡率的高低、地區差異和風俗的不同、財產所有權的變動，也是影響農民生育觀念

及其歷史演變的重要因素。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也許能夠使家產制與農民生育願望之間的內在關聯更加清晰，也更能揭示出現代性的計劃生育與鄉村生育觀念相悖的根源所在。

此外，文章認為「父親或丈夫的家產處分行為受到家庭整體利益的制約」，「家產制考慮的是所有家庭成員的利益，而不是某個人的利益」。這樣確實可以相對確保家庭成員的低水平生存，但是否能由此而認為農村的家產制具有「公」的特徵，而且是佔主導地位？

事實上，財產一旦實行分割，繼承人即使需要兼顧「整體性」，但他首先是擁有充足的自決權，有權力處置和決定所繼承財產的去向，這恰恰是一種「私」的體現。作者對於農村家產制的「公」與「私」問題，恐怕還需要作更為細緻深入的界定。

鄧宏琴 太原
2010.2.16

大眾喚醒的政治與啟蒙再轉向

盛嘉的〈胡適和儲安平抵制「標籤暴政」〉（《二十一世紀》2010年2月號），以「資產階級」概念為例，通過胡適與儲安平兩個個案分析了「標籤暴政」的危害，可謂在「尋找」與「探索」真理方面做了些許努力。

在共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之時，「革命」成為建構無產階級政權、捍衛無產階級利益與實現烏托邦理想社會的「福音」。這樣，大眾喚醒的政治決定了如此「夢想」將成為現實。在階級革命踐行過程中，

割「資產階級」尾巴及性命就成為理所當然，而在革命與後革命年代，「資產階級」被不斷地妖魔化、標籤化，並且成為烏托邦者以人民公意來反對、消滅的對象，這樣就不免造成「標籤暴政」的後果。

中國當前的現代化實踐，少不了資產階級，或言中產階級，這需要喚醒大眾進行啟蒙再轉向。在一個中產階級主政的國家，與生產發展並駕齊驅的是衣食足（經濟）、禮義興（教育文化），接着才有法治和民主。要實現此種局面，啟蒙再轉向不僅需要剔除國人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及大眾仇富心理，而且還需要打破對一些深入人心的標籤政治文化概念，如「資產階級」等概念的「標籤暴政」的桎梏。

簡言之，胡適與儲安平等少數人雖抵制過「資產階級」概念的「標籤暴政」，但因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沉默不語，「標籤暴政」嚴重干擾了後來中國社會的走向，形成獨轉逆流。中國未來走向公民社會或言市民社會，還需要一個自發自勵的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

黃文治 上海
2010.3.7

恩威並用治邊疆？

張健在〈新疆問題：族際矛盾還是分裂主義？〉（《二十一世紀》2010年2月號）一文中，強調族際矛盾的興起，着重論證了前蘇聯的民族理論對疆獨份子的影響，讀來令人耳目一新。在新疆，維漢間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給外界的印象是維族人民大眾「做牛做馬」，

而漢族資產階級「作威作福」，「7·5事件」就是這個累積已久的矛盾的集中爆發。

維族「被壓迫剝削」並非新中國成立後的鏡像。從晚清的左宗棠到新中國的王震將軍，他們對維族的鐵腕政策暫時贏得了政局的穩定，卻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可見，一味的「威」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中國政府一直相信經濟發展是解決民族矛盾的首要方法。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的經濟不可謂沒有發展，然而光鮮的數字背後，潛藏着差距拉大的事實。維族人民大眾以豐富而又低廉的自然資源換來了經濟增長，而那些原料到了漢族「資本家」手裏後搖身一變成為黃金萬兩！維族並未分享到改革開放應有的實惠，心有不甘，這種被剝奪感隨着國家GDP的增長而日趨強烈。

我們對客觀存在的民族、宗教矛盾，決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遠非國家出台扶持政策、給予優惠所能解決的。豈知他們除了經濟要求外，還有更高的政治民主訴求！正如張文指出的，「政府力量，如果不能體察社情、民情中的細微而重要的變化，一味從不符合實際的認識出發，又輔之以強大的專政力量，則本已轉變的社情、民情可能再次轉向反面」，所以建議給予能讓他們滿足的政治安排，以期待長治久安。當務之急還是要理清頭緒，坦承矛盾，提升政府公信力與國家綜合國力。

熊曙光 上海
2010.3.17